

回憶兩次奪取黃安城

汪立波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回憶两次夺取黄安城

汪立波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7年·武漢

回憶兩次奪取黃安城

汪立波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新新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1 $\frac{5}{8}$ 印張·22,000字

1957年12月第 1 版

1957年12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200

統一書号：T11106·49

定 价：(5)0.13元



說 明

一、这里所写的两次夺取黄安县城：第一次，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，接着发动起来了农民武装起义，当年11月間，夺取了黄安县城，活捉了国民党反动派县官賀知事；第二次，是在1931年冬，由中国工农紅軍第四方面軍圍攻黄安县城，战斗1个月又3天，消灭了国民党第六九师，活捉了匪师长赵冠英，把黄安县城又夺取过来。

二、我着重写的是黄安县七里、紫云、城区3区革命斗争的一般情况。至于黄安、麻城整个农民运动情况，我知道得不全，没有全面的写。

三、这段历史材料，因为过时太久，又没有原始资料作参考，专凭记忆，这就难免不发生错误。希望当时参加斗争的和知道情况的同志多多提供材料，以便补充和修改。

作者 1957年秋

革命的种子播种在黄安

黄安就是今日的紅安，是湖北东北部的一个小县。它的面积南北长百余里，东西寬約90里。东靠麻城，紧接大別山脉；南与黃岡、黃陂比邻；西北連接陂罗（即黃陂和河南的罗山）；正北面是河南的光山。黄安境内，除东北面接近大山外，其他大部地区全是丘陵地带，土壤肥沃，人口众多，自古称为魚米之乡。但是在地主阶级統治下，黄安的劳动人民却終年累月过着衣不遮身、食不糊口的悲惨生活。他們长期遭受着官府的苛捐杂稅的压榨和地主的重租重息的剝削，那时候又是长年軍閥混战，弄得民不聊生。所有这些，已經把劳动农民逼上了絕路，农民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黄安的党员董必武、郑位三同志等就毅然决然的站在工人阶级队伍的前列，对敌进行坚决斗争。黄安地区的广大农民群众，也就是在党和董必武、郑位三等同

志直接教育和鼓舞下发动起来的。

1926年北伐軍占领武汉后，大革命的风暴逐渐給黃安帶來了一片生气，革命的种子在黃安的土壤上逐渐的生长起来。从此，光明的太阳才照到了本来暗无天日的黃安。在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封建軍閥”、“打倒豪紳地主”、“打倒貪官污吏”、“取消苛捐杂稅”、“实行二五减租减息”等等的口号下，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。农民协会开始組織起来了，农民武装起来了，于是反帝、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火焰騰空而起。在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下，共产党支持农民，惩办了一批土豪、劣紳和恶霸分子，严重的打击了封建統治者，鼓舞了农民們革命必胜的信心，奠定了十年内战时期鄂东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基础。

共产党当地組織以董必武等同志为首，在黃安等地区领导了广泛的群众运动，发动与組織了广大的工人、农民、青年和妇女，建立了革命的統一战綫。广大的群众受到了革命教育，革命运动象干草樵上了火星一样，一点即着，越燒越旺。劳动人民有了觉悟，他們懂得了这个真理——要想活命，只有組織和团结起

来，坚决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开展斗争，这才是唯一的出路，才是彻底解放自己的正确方向。

組織起来，成立农会

1926年秋、冬，革命的烈火在黄安的七里、紫云、城区以及桃花等区燃烧起来。共产党派汪莫川同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。当时确定汪国香同志和我担任城区北乡的組織工作，我在汪莫川同志的鼓励下，接受了这一任务。可是在頑强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下，还不可能馬上大張旗鼓的发动群众，所以先秘密着手，互相串連，逐步开展。在开始时，加入农民协会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少数的貧苦成年农民。以牌坊店（在城区北乡，离县城18里）为中心，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，汪国香任农会主任委員，我这个大字不識的长工任委員兼自卫軍的队长。我村农民协会成立以后，1927年农历元月，周圍村庄的农民，紛紛要求党的負責同志去领导他們成立农民协会。从此各处的农民协会就象春雨后的竹笋一样，一个个蓬勃的生长起来。

农民协会成立了，有了党的领导，許多穷苦的农民腰杆就硬起来了。我家大門上紅旗招展，墙上、門板上、树干上，到处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大字标語。标語上写着鮮明的口号：“打倒豪紳地主”、“实行二五减租”等等。革命的声势，吓得周圍的豪紳地主象烏龟一样，鑽到土洞里連气也不敢吐。农民当家作主了；但是豪紳地主們是不甘心的，他們千方百計的使用各种无賴手段，打入到农会里来，破坏农民的革命运动。

豪紳地主阴謀篡夺农会領導权

1927年春，黃安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向封建地主轟轟烈烈的开展了斗争。貧雇农、积极分子不分昼夜的到处寻找地主算剝削賬，強制他們退出租息，叫他們写悔过書。可是，当时农村的党不仅人数少，同时斗争經驗也很缺乏，因此，坏人就有可能混入到革命陣营里来。那时候，国共两党正在合作时期。共产党为了推动革命运动，搞好統一战綫，在各方面帮助国民党开展工作，曾經讓許多党员以个人資格加入国民党，在国民党内工作。1927年，

黃安縣設有國民黨縣黨部。當時黨部的成員很複雜，誰是共產黨員，誰是國民黨員，是很難分開的。而黨部的負責人多半是地主成分，其中有些學生參加，也是地主的兒子。他們見到農民鬥爭地主，就有些動搖不定，或者面子放不下去，或者公開出賣農民的利益而叛變革命。這些投機分子，開始時表現假積極；但是農民實際行動起來向地主開展鬥爭時，他們就大叫“過火呀！不得了呀！農民無知識呀！”等等。後來，農會中的許多農民幹部，都被這些家伙排擠出去了。我村農會領導權就被李茂林（劣紳）、徐以漢（族長）、姜煥文（地主）等所篡奪，農民仍然受着他們的壓迫和剝削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農民協會已經變了質。農民們憤怒的說：“他們（指地主）怎麼肯為我們辦事啊！他們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不挨鬥爭。”事實的確如此，這些家伙同縣黨部右派分子串通一氣，破壞農民運動。在“四·一二”事變後，真正的共產黨員在血泊中爬起來，不怕任何犧牲，繼續領導人民，對敵堅決鬥爭；而那些投機分子，却都貪生怕死，而脫黨了。

共产党发动群众，开仓济贫

1927年二、三月間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，再加上1926年那年又是个歉收年，因此許多农民都断了口粮。在外采野菜吃的人遮天盖地，討飯过日子的人成千上万，可是地主、富农們却把大批的余粮都隐藏起来，不借給无飯吃的人。农民們在飢餓和疾病的交迫下，只好找农民协会的負責人想办法。但是把持着农会的那些投机分子們却置之不理，他們根本不顧穷人沒飯吃，而千方百計的在保护地主阶级的财产。正在这种紧急关头，革命派占优势的党部平巢委员会派人来了，支持农民打开地主的粮仓，救济无飯吃的农民群众。因为有了党部的支持，不管农会的負責人同不同意，我和汪国香就帶領农民干起来。首先就开七里区大地主汪玉辉的仓，同时強制各村的地主、富农把剩余的粮食借出来給无飯吃的农民。在开仓济贫的当中，混进农民协会的投机分子和地主的狗腿們威胁农民說：“你們小心啦！恐怕吃了鯽魚日后吐鯉魚。”农民回答說：“管你鯽魚、鯉魚，吃了再說。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借粮任务胜利

完成了，农民的灾荒也渡过了，大家生产的劲头高涨。豪绅地主也再不敢欺压农民了。

把混进农会的投机分子赶出去

1927年春、夏之间，举行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。这次大会闭幕后，黄安的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。广大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继续轰轰烈烈的向豪绅地主展开了清算斗争。

一天的早上，省特派员王建同志和他的爱人夏国倪同志（国共分裂后，夏国倪同志在武昌被国民党杀害），来到我村牌坊店，亲自指导农运工作。革命干部和群众非常欢迎。他们到农会刚一坐下，我的伯父汪心坦就急不可待的问王建同志：“农会是给穷人办事，还是给富人办事呢？”王建同志笑着说：“当然是给我们穷人办事的，这还用说。”王建同志这次来的目的，也正是为了整顿农会组织。在农民义愤的要求下，把混进农会里的投机分子都清洗出去了。于是农民的斗争情绪进一步高涨了起来，把豪绅地主的气焰压了下去。

斗争大地主，审判土豪劣绅

把混进到农会里的地主、富农分子清洗出去后，农民们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。一天的中午，召开农民协会会员大会，王建同志作了报告。他一面讲革命的道理，一面问大家：“你们为什么会穷困？你们一年到头，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种田，为什么没有饭吃？穷人是不是‘八字’不好？”他接着自己回答说：“不是‘八字’不好。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、压迫你们，是那些寄生虫喝了你们的血的结果。”大家在这样的教育和启发下，进一步提高了觉悟，一致要求党部同志批准斗争大地主们。

在党的领导和鼓舞下，农民们扛起了锄头、扁担，象潮水般地拥向大地主家里去，把顽抗的大地主捆绑起来，押着他们游行示威。这样的游行示威，增加了农民的斗争勇气，培养了青年和儿童的革命斗志。我记得，游行示威的队伍里的一部分儿童，十分活跃，他们同绑住的豪绅地主说理。他们还问那些土豪、劣绅说：“你们有钱有势的总是欺压我们穷人，今天再不敢厉害了吧！”

黃安县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沸腾起来了，斗争豪绅地主的火焰，燃烧到各乡各村。以郑位三同志为首的黃安县审判土豪、劣绅的委员会成立了。农民到处逮捕土豪、劣绅送往县城。省特派员王建同志，亲自到紫云区去领导农民向地主作斗争。大恶霸吴惠存在人民的巨掌下伏法了。3月間，在县城里召开了公审土豪、劣绅大会，公审大恶霸阮纯卿、袁合三、張英廷、李仕选和李介人（当时县議会的議長）等人，最后把他們全部当场枪毙。这次公审大会，是由郑位三同志等领导的。从此以后，全县农民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，农村中处处都在搞清算，强制豪绅地主退租、退押金，并且罚他們出款，筹办民校和救济貧苦的农民。在革命的高潮中，許多豪绅地主外逃，企图躲避农民的斗争；或者装穷叫苦，抗拒农民的清算。

“四·一二”事变

正当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，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、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“四·一二”事变爆发了。許多逃到河南光山

去的豪紳地主，勾結了光山地区封建势力领导的紅枪会，大举向黄安县革命的农村进攻。这时按武装情况來說，黄安真正能与敌人作战的，仅只七里和紫云两区的农民。但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协会的严密組織，大家不怕任何牺牲，齐赴前綫，与敌人苦斗1个多月之久。终于在端午节前夕，打垮了光山的反动紅枪会，扑灭了本地豪紳地主的气焰，巩固了革命的陣地。

接連又发生了“七·一五”事变，汪精卫集团又叛变了革命。黄安县城門楼上，貼上了武汉反动政府的布告，命令农会即刻停止一切活动，違者杀无赦。严重的考驗来到了，革命的战士英勇的繼續前进，怕死鬼却脱党逃跑。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中，省委指示郑位三同志繼任县委書記，坚持了黄安的革命斗争。

秋收大起义

剛把稻谷割完了，党派了汪奠川、叶耐青、鄒胜意、石世龙、明汉华等同志，來领导七里区和城区的秋收起义。这时，省委也派人來领导。据当时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，这次的起义

是配合全國的革命高潮；指示我們堅決奪取黃安城，建立革命根據地。

我們回到城區后，利用來朋串連，秘密的挨門挨戶講解黨的方針和政策。但是，因為武漢政府投降了蔣介石，加之反革命到處造謠，所以群眾思想有顧慮，不敢公開露面出來行動。經過一段工作，才發動了群眾。

於是黨在七里區、紫雲區領導農民捉拿土豪、劣紳，把沒收的財產全部分給貧苦的勞動農民。這年的秋天，黃安的農村煥然一新，再不象往年的秋8月了。往年的秋8月，地主老爺騎着馬、坐着轎，到處看稞收租，講七講八。今年這些傢伙象老鼠一樣，被農民趕得到處亂竄。農民們當家作主了，他們扛着烏槍，不分晝夜的去找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豪紳們算賬。

這時，土豪、劣紳為了恢復他們的黑暗統治，就勾結國民黨匪軍第三〇軍魏益三的部隊，到黃安來鎮壓農民革命運動。豪紳地主們跟着匪軍回到黃安，他們仗着匪軍的勢力，瘋狂的向農民反攻倒算，殺人放火，無惡不作。於是轟轟烈烈的秋收起義，不得不暫時停了下來。

這次秋收起義的失敗，是受陳獨秀右傾機

会主义的影响，犯了保守主义的錯誤。第一，秋收起义沒有把全县的农民发动起来，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农民只有3个半区——七里区、紫云区、城区和桃花半个区。第二，較多的考虑了保存革命的实力，因而沒有坚决的打击魏益三的军队。国民党的部队到黄安时，我們的农民自卫軍隱而不战。所以，秋收起义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結束了。

夺取黄安城，生擒賀知事

在秋收起义中，虽然犯了右傾保守主义的錯誤，但党在群众中的活动，是沒有停止过的。党的领导同志，在七里坪、古丰岭等处举行了数次秘密會議，决定組織群众，准备力量，夺取黄安县城。在一次會議上，黄安和麻城两县党的领导同志，决定以两县农民自卫軍和箭厂河附近的3堂“紅学”为主力，配合七里、紫云、城区、桃花等区的农民自卫軍（又称农民义勇軍），举行武装起义。

旧历10月23日，黄安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重整旗鼓，拿起梭标、烏枪、扁担、鋤头，象潮水般冲向了黄安县城。

城区北乡自卫军的任务，是运送爬城用的梯子和担架。我当时是城区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。

下午，太阳快要落山了，七里、紫云两区的大队人马，黑压压一片从北边过来了，遍地是红旗，到处是梭标、鸟枪、锄头、扁担。各区的自卫军走在农民自卫军的后面。农民自卫军的队员们，都腰扎皮带，肩扛长枪，子弹带和“赤化带”十字交叉地挂在胸前，真是威风凛凛。农民自卫军有的穿着短袄，有的穿着长袍。穿长袍的队员们，把长袍的前襟撩起来，扎紧腰带。大家手持红缨枪、锄头、扁担，有的还扛着杀脚鱼的叉。大路上，人山人海，浩浩荡荡的前进。天黑了，大队人马象一条长蛇，向着黄安县城摸去，越走天越黑，可是人们的心情越走越热烈。大家争着向前冲，恨不得一步跨进黄安县城，把敌人一口吞掉。

将近午夜的时候，从四面八方来的大队人马，把城池紧紧的包围起来了。城门闭得很紧，连一点空隙也没有。借着城上的灯火，隐约的可以看得见城墙上的人影，反动派象老鼠似的东爬西窜。农民队伍越聚越多，象个钢铁做成